

§ 中外文化交流 §

## 《论语》注疏之西方传承：从理雅各到森舸澜

金学勤

摘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历代注疏者众多。西方译介《论语》者亦多，但鲜有重视、传承和发扬传统注疏者。而理雅各和森舸澜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会中西，将经典背后的阐释传统呈现给英语读者，使他们不仅能够窥见儒经注疏传统的丰富多彩，更能真正理解《论语》是一部“活”的经典。认真考察从理雅各到森舸澜翻译和阐释中国典籍的策略和方法，以及他们的“学术型翻译”在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功，无疑能给我们的对外翻译事业带来不少灵感和启迪。

关键词：《论语》；注疏；理雅各；森舸澜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5)03-0058-08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论及其与弟子对话的著作，汉代以来一直受到注疏家的重视。宋代被朱熹纳入儒家“四书”之后，更是世代书生必读的经典。16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意识到孔子学说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及其对传教事业的制约，纷纷将儒家经典译入拉丁语，掀起了向欧洲译介儒经的浪潮。从19世纪起，随着新教海外传教事业的兴起和英帝国全球影响的扩大，儒经被频繁地译入英语。就《论语》而言，从180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塞兰波尔（Serampore）译出半部《论语》起，至今《论语》英译本已有数十部。据笔者统计，仅1990年代，美国出版的译本就有9部，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面世。对于儒家典籍的大量译介，有学者指出，“这一切都证明，孔子学说中一定有着新颖的、值得人类去追寻的思想，否则，西方世界何苦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阐释孔子的教义。”<sup>①</sup>译者钟情于《论语》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觉得前人的阐释不尽人意，有的是要为特定的读者服务。动机和对象不同，译本形态也各异。为传教士而译者，不免把儒家学说纳入基督话语体系，马歇曼译本便是其中之一；为西方初习汉语之士而译者，所重视的是中英文的字比句次，如柯大卫（David Collie）1827年的《四书》译本；为中西哲学对话而译者，一心想凸显的是中国传统的异质性，其代表作是安乐哲、罗思文（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t）合译的《论语》。在译介过程中，始终有一类译者非常关注《论语》章句的注释。他们明白，《论语》像其他先秦古籍一样，文本中有许多悬而未决、众说不一的地方，译者有义务让英文读者了解中国历代注疏家的不同阐释，以及西方《论语》研究者们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和对话。

注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范式，是古代经学研究的产物。“随着儒家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作注解，除注经之作外，后又出现了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的义疏。南宋以前，经与疏各单行，南宋绍熙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sup>②</sup>作为儒家经典，两千余年来，关于《论语》的各种注疏从未间断。对于注疏者而言，每一次解释既是和同行、前辈的交流，又是与孔子本人展开思想对话。代代相传，儒家学说因此得以传承，得以行在“当下”。反过来，一本经典背后源远流长的传统，也不容任何“当下”的读者忽略。即便

作者简介：金学勤，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孔子西方形象之建构《论语》英译阐释学研究”（09YJAZH060）

① Cheuk-Woon Taam, “On Studie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 No. 2, 1953, pp. 147-165.

② 《十三经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说明”。

在今天的中国，要真正了解《论语》章句的涵义及其相关争论，仍需参考历代学者的注疏。正是因为如此，若要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甚至欣赏这一儒家经典，帮助他们了解该经典背后的阐释传统，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中期的理雅各（James Legge）到21世纪初的森阿澜（Edward Slingerland），在《论语》的英语译介过程中，存在着重视、传承和发扬传统注疏这一学术范式的轨迹。

### 一、理雅各开创的“学术型翻译”（scholarly translation）

理雅各译介《论语》及其他中国典籍，国内学界论述颇多，在此不赘述。笔者仅对其在《论语》译介中开创的“学术型翻译”详加分解。

理雅各是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任英华书院院长20余年。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他把原本设在马六甲的传教站迁往香港。在一封专门给宗教传播协会的信中，理雅各说“无疑，从马六甲迁往香港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一次向撒旦权威的进军。”<sup>①</sup>一方面，传教士从来把异教徒视为敌人，以征服他们为荣。另一方面，理雅各的话也暗示传教事业无比艰辛，没有良好的策略必然收效甚微。理雅各从前人的经验和自身的实践中悟出，传教士唯有了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意识形态，方能征服“敌人”，让他们皈依基督教。为此，理雅各通过多年艰苦学习，于1850年代初开始了把儒家经典译成英语的宏大工程。20余年后，理雅各因翻译《中国经典》而功成名就，成为牛津大学聘请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回忆说“我对中国学术所做的成功之研究，乃是二十五年多的辛勤劳作的结果。为了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这一伟大的帝国，尤其是为了顺利开展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获得永久的成功，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将孔子所有的著作（儒家经典）翻译并加上注释出版，会为未来的传教士们开展传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sup>②</sup>

理雅各所谓“对中国学术所做的成功之研究”是指他的5卷本《中国经典》，而这一译作的第一卷第一部就是《论语》。为了给将来的传教士提供学习汉语和中国道德哲学的教材，理雅各在翻译中采用直译为主的策略，尽量给每个汉字找到对等词，竭力从句面上再现中文句子结构。《中国经典》问世后，中西方学者曾对理雅各的动机、策略和翻译质量提出过各种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因规模宏大、治学严谨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界影响甚大，至今犹在。理雅各的译著由三部分组成：中文原文、英文翻译、长篇注释。之所以称“长篇注释”，是因为注释至少占每页三分之一，篇幅更大时，甚至会占页面三分之二。理雅各把译文后面附上详尽注释的翻译定义为“学术型翻译”（scholarly translation）。他自己很清楚，在100个译本读者中，可能有99个人对译文后的注释不感兴趣。但是在他看来，“哪怕就为最后一个读者，一个勤勉的译者也要不遗余力地为其提供详尽的注释。唯有如此，一个译本才有永恒的价值，才能流芳百世而不被遗忘”。<sup>③</sup>

理雅各译文后的注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系统性。他翻译的《论语》，各篇首都有要旨提示及篇名意义解释。以《为政》为例，理雅各在篇首注释说“《论语》第二篇有24章，名曰‘为政’（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乃是前篇讨论的‘学’要引领和抵达的目标。本篇探讨什么是好政府及执政者应具备之素质。”<sup>④</sup>不仅如此，《论语》20篇凡500章，各章各句均有注释，内容丰富，总体包含三大部分：概括本章大意、解释疑难字句和概念、比较和发表评论。举《里仁》篇“子曰‘朝闻

① 理雅各《汉学家理雅各传》，马清河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②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1), Hong Kong: H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

③ Norman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62.

④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1), p. 145.

道,夕死可矣。’”为例。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Master said, “If a man in the morning hears the way, he may die in the evening without regret.” 这一章很短,但理雅各的注释并不简单。他先用一个词组概括本章要旨为“闻道之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 RIGHT WAY),接下来他说:

此处“道”的英译不好把握,朱熹释“道”为“事物当然之理”(the principles of what is right in events and things),而《四书翼注》之解释更为合理“道即率性之道”(道 is the path — i. e. of action —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ature)。人生之目的即在于闻道,人若至死不闻道,其死与野兽之死无异。从本章中我们隐约意识到对某种更高真理的模糊认识,这乃是中国先贤未能明确指出的。何晏对本章持不同见解,以为这是孔子之哀叹,恐自己至死而不闻道,意即“我若能朝闻道,夕死而无悔”。本章还有其他解释。<sup>①</sup>

这个注释体现了理雅各先“注”后“疏”的特点。首先是解释本章“道”这个疑难概念,他先引用朱熹的“事物当然之理”,再指出《四书翼注》的“道即率性之道”这个解释更为合理。可见,理雅各在采纳朱熹《论语集注》对字词章句的解释之时,也不时参考其他注疏,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疏”的部分,理雅各从“道”很快过渡到文本隐约体现的“对某种更高真理的模糊认识”,并遗憾于孔子这个“中国先贤未能明确指出”这一更高真理。他所谓的“更高真理”显然就是“基督之光”。理雅各不失时机地抓住儒家的“道”,宣扬基督教义之完美,并隐约批评孔子之不足。和天主教士一样,新教传教士以耶释儒的策略在此展露无遗。

撇开传教士的偏见,理雅各的注释可谓用心良苦。从1840年初抵达马六甲,到1861年在香港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理雅各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汉语和研究儒家典籍,其决心和恒心令人敬佩。后世学者批评理雅各译“四书”唯朱熹马首是瞻,忽略了其他注疏家,实际上有失公允。以朱熹注本为主是事实,也有据可依:一是朱注是集大成之作,二是明清时代朱熹的观点一直居主流地位。但理雅各不仅举出《四书翼注》,也了解何晏和他人对同一章句的不同疏解。理雅各在第一卷“前言”中列出的儒经注疏和中文字典类参考书就有33部,其中如《十三经注疏》、《四书诸儒辑要》、《皇清经解》、《孔子家语》、《二十四史》、《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其译作注释篇幅巨大也正在于内容翔实、旁征博引而又严谨有序。安乐哲、罗思文在20世纪末翻译《论语》时评论说“对朱熹的传承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当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们来到中国,着手翻译儒家典籍时,他们从自己的老师处继承了朱熹的注经传统,这个传统在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中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天,理氏的《中国经典》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翻译儒家典籍的标杆。”<sup>②</sup>理雅各的翻译能成为“标杆”,这与他坚持把经典背后的儒家释经传统相对完整地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氏在其所有的翻译中,自始至终尊重并忠实于原文文本的整体性。从他早期出版的译作,尤其是1861年到1872年出版的《中国经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总是把中文原文放在最前面,把自己的译文和注释放在次要的位置。通过在译文后加上英文注释的方式,理氏把他的读者带回到了中国传统(注疏)学术的中心位置,这对于理氏之前、理氏同时代甚至其后汉学界采用的释意法(paraphrasing procedures)而言,无疑是个重要的进步。”<sup>③</sup>

## 二、森舸斓对《论语》注疏的传承和光大

在理雅各之后的150年里,《论语》英译事业薪火相传。20世纪影响大的译者有威利(Arthur

<sup>①</sup>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1), p. 168.

<sup>②</sup> R. T. Ames & H.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Pub. Group, 1998, p. 17.

<sup>③</sup> Anne M. Birrell,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Mythological Tradit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38, No. 4, 1999, pp. 331 – 353.

Waley)、庞德(Ezra Pound)、刘殿爵(D. C. Lau)、李克曼(Simon Leys)、安乐哲和罗思文、白牧之和白妙子(E. Bruce & A. Taeko Brooks)等。毫无疑问,这些翻译各具特色,均是上乘之作。威利译笔清新、阐释独到,甚至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无可匹敌的《论语》翻译家”;<sup>①</sup>庞德以诗性情怀诠释孔门经典,文字简练、意象新奇;澳籍比利时人李克曼的《论语》用简朴的英语塑造了谈吐优雅、言之有据的孔子形象。但是,这些译者的共同点是皆未把《论语》的注疏传统呈现给读者。他们的译本或有页面脚注,或有书后尾注,但都为数甚少,过于简略,与理雅各的注释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注释的多寡详略关乎译本的篇幅,也和译者的目的及期待读者有关。比如庞德,他的译本不仅注释极少,就连正文用词也简洁无比,因为他的目的在于用诗化语言再现《论语》的含蓄简练和铿锵节奏。华人学者、比较哲学家刘殿爵长期在英国伦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国哲学课程教学,他的《论语》英译本1979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汉学界深受好评,颇有影响。杜润德(Durrant)1981年发表《评〈论语〉翻译》一文指出“《论语》译者的名单上包括了几位西方最杰出的汉学家:理雅各、苏慧廉(Soothill)、翟林奈(Lionel Giles)、顾赛芬(Couvreur)、卫礼贤(Wilhelm)和威利,现在我们必须把刘殿爵的名字增加进来。刘氏对中国哲学和语言的研究,加上他已经出版的两部译作(指《道德经》和《孟子》),使他跻身于当代汉学研究的前沿。”然而该文同时指出,“遗憾的是,像刘氏这样杰出的学者却没能译本中提供详细的注释。但愿当下出版商们追求‘无障碍文本’的时尚尽早过去,尤其在这个许多章句的意思仍然众说纷纭的领域,读者多么期待像刘氏这样的学者能给出合理的解释。”<sup>②</sup>1998年,白牧之、白妙子的《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在美国出版,再次向读者提供了翔实的疏解。但是,《论语辨》的重心不在翻译和注释本身,而在于两位译者通过数十年文本考据研究精心建构的《论语》成书“层累论”(accretion theory)。笔者曾撰文评述白氏二人的理论看似精密宏大却没有扎实可信的证据支持,在此不再细究。<sup>③</sup>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正是白氏的《论语》成书论和《论语》翻译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森舸澜英译《论语》。为了让读者体会《论语》思想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森舸澜采取了详细注释的方法,客观上继承和发扬了《论语》注疏传统,让21世纪的英语读者得以窥见儒经注疏的丰富多彩。

森舸澜的《孔子论语》(*Confucius Analects*)于2003年出版,是他从事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产物。<sup>④</sup>全书内容包括三部分:序言和前言、译文和注释、五个附录。森舸澜在“前言”中简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他认为了解孔子和儒家出现的社会背景对现代“有历史和哲学意识的《论语》读者至关重要”。中西学者针对《论语》编撰和全书主题有过不少争论,森舸澜对此非常清楚。他指出,这一分歧化作两极,一极以刘殿爵-崔述模式为代表,认为《论语》前15篇相对较早,后5篇相对晚出。两部分虽有时间早晚之别和性质上的差异,但整体上体现了相同的主题。另一极则以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为代表,认为《论语》20篇按时间早晚分为4层:核心层第3~7篇,第2层包

① Alice W. Cheang,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2, No. 3, 2000, pp. 563–581.

② Stephen W. Durrant, “On Translating *Lun y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 No. 1, 1981, pp. 109–119.

③ 参考金学勤《论美国汉学家白氏夫妇的〈论语〉“层累论”成书说》,《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森舸澜,斯坦福大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主修均为东亚语言,尤其是中国文言。1998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宗教研究博士学位,主攻中国古代哲学。目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东亚研究教授。森舸澜学术兴趣广泛,除了中国古代思想外,还涉及德行伦理学、阐释学、宗教比较研究、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尤其注重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比如将认知科学用于阐释宗教和哲学思想,探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等。其近年的著作均是跨学科研究,包括200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研究的科学之鉴:整合身体与文化》(*What Science Offers the Humanities: Integrating Body & Culture*),以及201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与科洛德(Mark Collard)合著的《实现一致:整合科学与人文》(*Creating Consilience: Integrating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等。

括 1、2、8、9 篇,第 3 层 10~15 篇,最晚一层是第 16~20 篇。<sup>①</sup>这一观点,在白牧之、白妙子的《论语辨》中得到充分发展,达到极致。森舸澜指出:“(白氏二人)认为《论语》每一篇都是单独的一层材料,并从每一篇中找出大量‘后世的贋文’(later interpolations),声称《论语》之编撰时间比传统看法要长得多,最后的各篇晚到公元前 3 世纪才进入书中。白氏对《论语》的篇章进行彻底重组,认为《论语》是各种互相矛盾、不同性质的材料之杂合。然而,这样的观点带有很强的猜测性,相比之下,刘殿爵-崔述模式可能最接近真实情况。”<sup>②</sup>白氏的情形实属例外。他们的怀疑论始于崔述,却远远超出崔述。可见,在《论语》文本性质和编撰过程上,森舸澜和威利、刘殿爵等人一样,坚持相对传统的看法。森舸澜认为,《论语》反映了孔子对政治、为学、仁德等问题的观点,主题是统一的,并没有后世“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学派与墨家、道家之间争论的内容。他在“前言”中接着写道“尽管《论语》的材料的确显示出有时间早晚的差别,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但《论语》各部分在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以及对于宗教的态度等方面都是连贯一致的。我们要明了第 16~20 篇或许是更晚一些的内容。但从全书中找不到一丁点儿与孟子时代的人性之辩相关的心性等复杂的概念,也没有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等文本中弥漫的学派间的敌对氛围。《论语》中的任何材料不可能晚于公元前 4 世纪早期,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论语》是孟子和荀子之前的‘孔子学派’的观点之真实再现。”<sup>③</sup>

森舸澜译本特色是译文后的注释。他的译本没有收录《论语》原文,而是把注释直接放在各章译文之后,注释的篇幅多是译文的数倍。这类似《论语》的汉语注疏,方便读者查阅,不需要时直接跳过。森舸澜详细阐述了注释对于理解《论语》章句的必要性。他认为,《论语》成书于两千余年前,虽然看似很有条理,但因语言简练,缺乏语境,许多章句含蓄难懂。当然,这种含蓄难懂或许是编者故意为之,正如《述而》中孔子所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可见,孔子要求弟子勤于思考,自己探求问题的答案,于关键之处方开导启发,使弟子们能举一反三。孔子的话常常是为引出弟子的回答或发问,然后再纠正和评论。从这个角度看,《论语》的章句原本均有具体的语境,离开了这个语境,就很难悟出师徒间对话的意义。但是孔子死后,弟子们与其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一困难却促成了另一种对话的产生,那就是长达两千多年的《论语》注释和疏解。森舸澜认为,这一源远流长、不断扩大的《论语》注疏传统反映了后世人们,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儒家典籍所做的另一种“举一反三”的贡献。即便在当今的中国,《论语》读者离开了历代学者的注疏和阐释,也很难懂得文本的意义。他引用梅约翰(John Makeham)的话说:“离开了注疏‘语境’,《论语》文本便是空空的骨架,没有一点肉,读起来常常让人觉得不过是偏狭训令和干瘪对话的杂合,意义隐秘含混。正是注疏赋予《论语》生机,成全其作为儒家经典的本质。”<sup>④</sup>可是许多英译本往往很少注释,让本来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西方人一接触《论语》,就被隐秘难懂的文本吓倒,只能敬而远之。

森舸澜在其译本“前言”中阐述了自己遴选注释的原则和标准。他指出,两千余年来,针对《论语》的注疏、阐释和研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1967 年严灵峰编著的《无求备斋论语集成》,收录各类《论语》注疏和研究,包括白文本、全解本、札记本、辑佚本、敦煌唐写本和索引本等,全书共有 308 卷。将所有的解释都收进一册书,实在不可能。况且,各家阐释虽自成一派,但围绕字词章句的分歧和争议颇多。翻译过程中怎样选择古人和今人的注释,是译者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理

<sup>①</sup> Edward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3, p. xiv.

<sup>②</sup>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p. xiv.

<sup>③</sup>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p. xv.

<sup>④</sup> John Makeham, “The Earliest Extant Commentary on the Lunyu: Lunyu Zheng shi zhu,” *Young Pao*, Vol. 83, Fasc. 4/5, 1997, pp. 260-299.

雅各的注释很长，也很有条理，但主要依据是朱熹的《论语集注》。这种办法虽好，却限制了译文读者的视野，朱熹的《集注》明显带有佛家和道家的世界观，有别于其先后世诸家的看法，但也仅是一家之言。为了更好地体现各家之说，森舸斓最后选择了程树德四卷本《论语集释》作为主要参考的中文底本。《论语集释》所引书目“六百八十种，全书共一百四十万言”。撰者“本孔子‘述而不作’之旨，将宋以后诸家之说分类采辑，以为斯书之助。在学术上力求不分宗派，苟有心得，概与采录，以供学者研究”。<sup>①</sup>该书将汉代以至清代儒家研究《论语》的精华集于一体，汉、宋并重，乃《论语》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森舸斓以程本为基础，正是看中了该书收录的注释丰富、兼收并蓄、不宗一派的特征。他在“前言”中说“此译本提供丰富的注释，旨在让读者体会到《论语》语境之丰富多样，见识一下处于其自然居所中的一部活的文本。我致力营造的体验可以这样来描述：想象你在阅读《论语》时，身边有这样一位朋友，他熟知文言，对怎样读这部书了然于胸。在你阅读过程中，他能快速浏览卷帙浩繁的注疏、札记、解释，以及其他针对文本的秘解偏方，时不时大声提醒你，某某解释有助于你理解，某某说法颇有见地，如此等等，而且还能为你指点相关的英文学术研究，供你进一步探索之参考。”<sup>②</sup>

《论语集释》采摘精华，通过征引大量前人的诠释，为《论语》读者打开了视野，同时也为他们留下自我思考和选择的空间。森舸斓英译本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为《论语》章句提供多种阐释及其来源，告诉读者从哪些前人作品中可以获得更深刻的意义，实际上是尽力将部分权利让渡给英文读者。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来领略森舸斓译本注释的大体面貌。如《学而》第7章“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森舸斓译文后的注释如下：

许多评论者认为，本章第一句指男女两性间的正当关系，即夫妇一伦。这一解释就是将本章中提及的四种品质匹配“四大人伦”：夫妇、父子、君臣、朋友。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此外，“易色”（上文译作“改易好色之心”）亦可理解为“不重美色”。<sup>③</sup>“贤贤易色”一语，历来争议颇多，乃《论语》中难解之句。仅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就引有何晏、黄侃、朱熹、陈祖范等人的不同观点。如引何晏《集解》曰“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引皇侃疏曰“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故曰‘贤贤易色’也。然云贤于贤者，亦是奖劝之辞也。又一通云：上‘贤’字，犹尊重也。下‘贤’字，谓贤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引朱熹《集注》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又引清人陈祖范、宋翔凤之说，以《关雎》、《车辖》等诗为例将“贤贤易色”解释为指“夫妇一伦”。<sup>④</sup>森舸斓译“贤贤易色”为“Imagine someone who recognizes and admires worthiness and therefore changes his lustful nature”，大意是“一个人若能发现和崇尚贤德从而易其好色之心”，可见他从《集释》列举的众多释义中最终采纳了皇侃的部分观点，以及朱熹的解释。其实，围绕该句的各种解释，共通之处是“贤贤”之义，分歧主要在“易色”二字上。森舸斓没有选择《集解》的“以好色之心好贤”，亦未选择皇侃的“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关键在于考虑到该句和之后三个小句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将各小句串联成连贯的整体，以阐明“学”的意义。

森舸斓是当代西方从事儒家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他熟悉中国历代学者对《论语》的评注，更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前言，第3页。

②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p. xiii.

③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p. 3.

④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卷），第31页。

了解西方学界前辈学者们的阐释。因此,森舸澜的注释不仅细致详尽,而且中西方观点皆采。他不仅从众多的中国古代注疏中做出选择,同时还兼顾和甄别西方学者的意见。他在注释中常引用西方前辈学者的观点或译文,并用脚注标出引文来源,方便读者参考。从其脚注看,他引用最多的是理雅各的《礼记》、《书经》、《诗经》和《春秋》等译本;其次是威利、格瑞汉(A. C. Graham)、高本汉、刘殿爵、王志民(John Knoblock)等人翻译的《诗经》、《老子》、《书经》、《荀子》等作品。以《八佾》篇的“奥灶之辩”句为例,看看森舸澜的注释就能体会他在古今中西间的考量和选择。原文:“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祈也。’”森舸澜在其译文后注释道:

本章有多种解释。字面上看,这是一则“消极悲观的民间传说”(威利语),意思是,宁可填饱肚子,也不要将食物浪费在祭祖上。尽管孔子本人在鬼神问题上持不可知论,但违背“礼”的此等粗俗实用的观点必然是他所谴责的(参考下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还有一系列隐喻性的解释,认为本章暗指当下卫国之事态,本章中提问者王孙贾就在卫国任大臣。奥位于房屋的西南角,乃祭祀祖先之地,是个重要的地方。而灶则不然,它在祭祀中并不重要,却是一家子每天生活的中心,乃实用之地。有些解释认为,“奥”在此借指卫君之近臣(孔安国:奥,内也,以喻近臣),或指只有名义上的君王地位并无实权的卫君本人(朱熹: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而“灶”则指卫国之窃权者王孙贾。按如此理解,王孙贾实际是告诫刚刚来到卫国的孔子(或许因丢掉了鲁国的职位前来谋求差事),真正重要的是向王孙贾表达崇敬,而不是那有名无实的卫君。这显然有悖于礼(逆天之举),所以孔子批驳了他的观点。还有别的解释,认为这是王孙贾用来证明,自己放弃在周天子朝中就职而选择跟随更加有实力的卫君,乃是明智之举。<sup>①</sup>

森舸澜首先引用威利的解释来说明,这是一则“消极悲观的民间传说”。接着从奥、灶在房屋之位置和用途开始,讨论各家注释中的隐喻层面,包括孔安国和朱熹等人的解释。然后针对提问者王孙贾和答问者孔子各自的处境,厘清各种观点。从本章整个注释看,他先后引用威利、孔安国、朱熹等人见解,综合中西观点,成功地把章句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从而让读者能够理解和感知《论语》,不再将之视为一部孤零零的、干瘪的言论集,而是一部“活”的经典。

### 结 语

从理雅各到森舸澜,在英语世界创建了对《论语》的另类翻译文本。理雅各为了新教征服华夏帝国的荣耀,数十年如一日地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他采用“学术型翻译”方法将十多部儒经译介给西方英语世界,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之毅力、锲而不舍之恒心和严谨专注之品格,令人景仰,堪称楷模。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他把儒经注疏这一传统学术范式在翻译中创造性地再现出来,尽管他的翻译因过于忠实于原文字面意思和句子结构而受到不少批评,但通过详尽的注释,他为那些企图通过《论语》学习中文和了解孔子思想的英文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从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至今已经150多年了,理雅各的译本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成了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学习和研究儒家思想者不可忽略的著作。其原因就在于理雅各的翻译不只是对《论语》章句的单纯转述,而是把儒经背后的阐释传统呈现给了读者。森舸澜在继承前辈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汇中外之观点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阐释。他驳斥了以白氏夫妇为代表的将孔子虚构化、把《论语》编撰政治化的论调,凸显出《论语》是一部主题统一、结构连贯的儒家经典。同时,他明确了详细的注释对于英语读者了解《论语》的意义,指出每一位注疏家不仅是在与前辈学者就

<sup>①</sup>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p. 22.

《论语》文本展开对话，也是在与孔子本人展开思想交流。他的译文注释继承了理雅各开创的传统，博采众家之长，为21世纪的英语读者呈现了一部系统连贯、不断发展、历久弥新的儒家经典。

当今中国，面临着在国际社会构建文化自信的巨大挑战，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成为重大议题，怎样把中国古代优秀作品推向世界以吸引更多的域外读者是当今学界思考、讨论的话题之一。对此，政府还投入巨资，组织开启宏大的翻译工程。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涉及那些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认同的经典文本时，更是复杂艰巨。成功的翻译有多种形态，但共同点是都有较为明确的读者对象。理雅各和森舸澜心中的读者是那些真正想了解《论语》及其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传统的人，因而他们翻译《论语》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大大超出普通的译者。两位译者重视、传承和发扬《论语》注疏传统的学术行为，以及他们的“学术型翻译”在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功，无疑能给我们的对外翻译事业带来不少灵感和启迪。

## Transplanting *The Analects* Commentary Tradition in the West: from James Legge to Edward Slingerland

Jin Xueqin

**Abstract:** *The Confucian Analects* has witnessed many generations of annotators and commentators in the past 2,000 years. Among the numerous Western translators of *The Analects*, few have devoted due attention to representing the long exegetic tradition underlying this classic. This paper looks at two special cases, namely, the translating of *The Analects* by James Legge and Edward Slingerland respectively, and tries to demonstrate how these two translators have managed to creatively present to the English readership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making classical annotations. A careful study of their academic methods, the author believes, will contribute to our current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 works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Analects*, classical commentaries, James Legge, Edward Slingerland

(责任编辑: 庞 礴)